

·理论园地·

新文化运动中的图书馆事业

智晓静 (厦门大学图书馆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和模式、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为中国新式图书馆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学习的榜样及人力资源上的保证,并促成了新图书馆运动的爆发。新图书馆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在图书馆领域的发展与继续,在输入西方文明和科技、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推动公共教育的普及、保存国故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新图书馆运动 图书馆事业史 中国 近代

中图分类号:G259.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9)01-0033-04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use in New Culture Movement

Zhi Xiaojing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New Culture Movement gave an impul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use. Advanced western ideas and means on libraries were introduced largely into China, if provided the inward and public preparation, successful examples and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libraries, and led to New Library Movement, which wa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produced great efforts to introduce western civiliz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elerate school education, popular public education and save national heritage.

Key Words: new culture movement; new library movement; library cause history; China; modern times

CLC number: G259.295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9)01-0033-04

1 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关系步入了对话的历史新时期,西方列强利用坚艇利炮轰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传入中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重创了中华文明“天朝大国”、为我独尊的优越心态,促使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苦苦思索中国落后而西方强大的原因。他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以及学习西方文明的必要,于是发起新文化运动,对外开放,积极宣扬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并以此为参照,改革中国旧有的社会、政治、文化体制,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

鉴于教育在西方各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兴办新式教育来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作为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教育发展的得力方式之一的图书馆,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新文化运动

干将们的关注:“近今教育趋势,多依赖于图书馆,而民族文化,亦即于是岌之……非力谋图书馆教育之发展,不可与列邦争数千年文化之威权。”^[1]“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2]因此,在空前的对外开放的时代氛围中,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和模式、理论和方法,大肆涌入中国并获得广泛传播,为中国新式图书馆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以及学习的榜样。

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时代热潮中,不少立志报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出国求学,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他们学成归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术参与改革活动,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中国最早出国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人才如沈祖荣、胡庆生等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些专业人才为图书

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上的保证。新型图书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时而生,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 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的“新图书馆运动”^①

辛亥革命后,我国图书馆已经开始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新式图书馆转变,一些主要图书馆摒弃了旧式藏书楼的办馆方针和管理方法,藏书由完全封闭或少数人占有逐渐向社会开放,并开始采用西方图书馆的先进管理方法,但是这些措施只是零散、局部性的,缺乏系统和整体性,图书馆事业中还有着诸多陈规陋习,亟待突破。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各种新的学术思潮不断涌现,反映各种新思想、新观点的书刊资料迅速增加,人民的求知欲普遍高涨。受当时社会潮流激励,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图书馆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场所,担负着输进知识、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担。当时的早期图书馆学家,“与其时正轰轰烈烈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相呼应”^[3]发起“新图书馆运动”,一方面“破除陋习”,一方面“建设新规”,在普及图书馆知识,宣扬新的图书馆理念,培养新型图书馆人才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封建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的彻底转变,并将教育功能注入新式图书馆,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思想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

1917年,留学美国获得图书馆学硕士的第一人——沈祖荣学成回国,联合韦棣华、胡庆生等,携带有关新式图书馆的影片模型、统计表等资料前往华北、华东、中南各省进行宣传、演讲,普及图书馆知识,帮助民众认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与功能,推广美国图书馆学理论和管理方法,倡导图书馆改革,从而拉开了“新图书馆运动”的序幕。

新图书馆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在图书馆事业领域的发展与继续,它除旧布新,旨在“反对封建藏书楼,提倡新式图书馆”,很快引发了全国性的图书馆改革风潮。这次运动主张学习欧美先进的办馆方式和理念,同时又切合中国的实际,以提高国民教育素质为目标,宣传“平民教育”,倡导图书馆公共精神,实行“开架阅览”、“随意阅览”等一系列办馆举措,并以列强退还的庚子赔款来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这次运动促成了民众对图书馆价值的普遍认同,提高了民众对新式图书馆的利用率,使图书馆的公共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提升了图书馆的管理水平,促成了中国图书馆与国际的接轨和沟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直接促成了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4]

3 新文化运动主将对图书馆事业的倡导

新图书馆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场运动,在于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当时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胡适、鲁迅、李大钊、陶行知等都十分关心图书馆事业,积极参与图书馆改革和建设。

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胡适非常注重图书馆的功效。1915年,当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在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1922年7月6日,他与蒋梦麟一起就日本赠款用途拟定计划的第一项即是“设东方历史博物馆及图书馆”。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胡适是捐款最多者之一,被推举为董事及财政、索引委员会委员。他还曾于1930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图书馆协会年度第三次常会,并作重要讲演,坦陈图书馆的重要性:“能供真正之智者,唯有图书馆耳”,并称赞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北平近数年来,图书馆事业大有进步”,“余欲长留此以享诸君所供给之便与眼福”。

作为“五四”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颇多。1912年,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科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直接管理全国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机构,领导、管理全国的图书馆工作是其主要业务之一。在这个岗位上,鲁迅为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如组织京师图书馆的搬迁开馆、参与筹办京师图书馆分馆和通俗图书馆、具体负责创办中央公园图书阅览室等。在鲁迅日记中,有许多关于图书馆建设的记载,具不完全统计共有94次之多。^[5]

李大钊于1918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就是由《新青年》等现代报刊联合北京大学策动和导引的,《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堪称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李大钊正是借助这两个平台,将当时还比较冷门的图书馆学引进大学讲坛,领入中国学术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飞速发展,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图书馆之父”。同时他又将北京大学图书馆办成了中国图书馆史上第一所利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让图书馆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进程的一个重要公共平台。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5年任职期间,李大钊对该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顿和改革,仅1918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有关图书馆改革的公告就多达15次。^[6]在其主持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制定出中国第一个图书馆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馆试行条例》,内容涉及图书馆各个业务部门和各项业务

^①关于“新图书馆运动”的起始时间,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本文从较多人的看法,将之大致廓定为1917~1926年。

工作,对业务工作流程进行系统规范;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入新建成的沙滩红楼,增设阅览室、书库、分馆,建立了一整套以红楼为主体的新的读者服务体系,并采取开架阅览、延长开馆时间、允许图书外借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服务效率,有效地改变了旧图书馆重藏轻用的顽症。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一所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学图书馆,不仅为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有效的辅助,而且利用自身的领军地位,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非常注重图书馆的教化功能,自觉地以图书馆为阵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利用进步书籍教育广大青年学生,通过图书馆联络广大民众,凝聚民众力量。此外,李大钊还非常注重馆际联系和协作,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第一个图书馆专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于1918年12月在北大成立,将图书馆改革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非常重视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把图书馆看作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改造社会的工具。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任主任干事,他把图书馆教育列为专门调查内容,委托沈祖荣开展图书馆教育调查。1923年,他组织平民读书运动,掀起民众教育思潮,提出“创设平民图书馆”^[7]意在以图书馆为阵地领导平民教育运动,积极响应新图书馆运动。1925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领导下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陶行知对该协会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称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催生婆”^[8]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15人一同被推选为董事。他还领导创建了中国近代较早的协会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和纪念图书馆——东原图书馆。

此外,梁启超等德高望重的前辈也非常关注图书馆建设。梁启超曾积极宣传外国图书馆的状况:“举国书楼以千百计,凡有水井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此所以举国皆学,而甲富天下也。”^[9]号召中国学习西方,以新式图书馆作为富国强民的有力方式。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更是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于1916年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1925年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首任董事部部长及分类委员会主任,1926年又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为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有识之士利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不遗余力地宣传新图书馆思想,将图书馆事业有效地融入新文化运动之中,极大地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功效。

4 新文化运动中图书馆的功效

4.1 沟通中西,输入西方文明和科技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交流蔚然成风,国内各种先进报刊杂志大量翻译、介绍各种外国文章和书籍,将世界各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知

识广泛地介绍给中国。当时的新式图书馆,纷纷响应时代的吁求,大量引进这些介绍国外先进思想的报刊、书籍,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民众接触、了解、学习国外知识的最主要的平台之一,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艺思想的大解放。

“五四”前后的有识之士非常注重图书馆“输入文明,开通知识”的功效,他们对比世界先进国家与中国,发现“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闻然无闻焉”^[10]遂主张向先进国家学习,在中国设立新式图书馆,利用图书馆“进以世界之知识”,输入西方先进文明和科技技术,沟通中西,加速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教会图书馆在沟通中西,输入西方文明和科技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教会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年代最早的新式图书馆,是中国人了解和观察西方先进文明的窗口、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平台。这些教会图书馆系采用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营造而成,是中国近代新式图书馆的先锋。“五四”期间,教会图书馆事业继续稳步前进,为了响应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兴办新式教育的需求,教会图书馆纷纷和大学联姻,许多兼具教会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性质的新式图书馆应运而生,如1916年的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19年的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22年的山东齐鲁大学图书馆,1925年的辅仁大学图书馆、天津工商学院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尽管规模有限,却带来了西方新式图书馆的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成为向中国人输入西方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一个主要阵地。

4.2 辅助教学,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

“五四”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校图书馆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当时许多教育家非常重视图书馆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称学校图书馆为“学校教育成功的要素”、“大学的命脉”、“教育的机关”,是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和必要补充,直接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和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在他所拟定的教育方针大计中,曾把大学图书馆列为“革新之起点”的重要地位。陶行知领导创建专业的教育图书馆的“宗旨是辅助专家对于教育学术的研究,并帮助总事务所所在地的教育增进普通学识”^[11]即为从事教育的人员提供高水准的图书馆服务,辅助教学科研工作,发挥学校图书馆在传递知识、传承学术、服务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功用。

当时的教育家还强调高校图书馆作为“无名的教师”、“第二课堂”的作用。李大钊说:“现代的图书馆已经不再是藏书的地方,它是教育的机关,所以和教授有着密切的联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从前的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现代不满意这种制度,在课本以外,还有教师指出许多参考书作为学生的自学教材,按照新的教授法去实

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的参考书,决不能发生效果。”^[12]提倡以图书馆为平台,针对学生的特点,激发学生学习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他们还意识到学校图书馆不仅是传播知识的阵地,更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场所,所以倡导学校图书馆利用自身的优势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养。

4.3 开启民智,推动社会教育的普及

清末民初,虽然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已引起关注,图书馆数量有所增加并逐渐对一般民众开放,但是专制统治下的教育不普及,且图书馆所藏多是深奥难懂的典籍,不符合一般民众的需求,所以大多数图书馆利用依然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崇尚民主,致力启蒙,强调图书馆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13]因此他们呼吁:“只有充分发展图书馆事业,国民才有机会利用图书馆,国民的文化素质才能提高,启蒙国民性的目的才能实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各种公共图书馆、社会图书馆、通俗图书馆被纳入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工神圣”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响亮的口号。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工的伟大力量是社会发展的保证,只有他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李大钊呼吁:“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14]公共图书馆的大众性、普适性特点,将传统的图书馆和图书使用、接受教育的机会,由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品,转变为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这些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一般民众,服务功能在于教育社会大众,所以其馆藏由深奥趋于平实,藏书种类不再限于珍本、秘本、孤本、抄本等,而转为注重实用性,以满足一般民众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适合的书,让他们在轻松舒适的图书馆环境中,享受学习知识的机会,提高自身文化水平。

由于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才刚刚起步,远远无法达到普及,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还无法进入大学学习,普及性的社会教育尤其必要。公共图书馆教育超越学校教育的局限,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并且在服务方式和提供的文献资料方面优越于其他形式的教育,给读者提供的学习环境更为宽松和谐,让读者通过休闲式的图书阅读,获得精神上的共鸣,从而有效地完成了社会教育机构承担的传承和更新人们文化知识,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任务。此外,公共图书馆还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进步思想的最佳场所,在对工农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

4.4 保存国故,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晚清以来的中国,正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机制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私家藏书大量流散,一些珍贵文献甚至流落异国。新图书馆运动发起后,全国各大图书馆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指导下,开始注重保存国故,努力搜集各种珍贵古籍以及各民族文字书籍,有的馆还专门设立金石部来保存珍贵古籍金石拓片,各省立及地方图书馆则肩负搜集、保存地方文献的任务,尽力收藏乡贤著作,刊行掌故丛书,有条件的地方馆还添设了历史博物部,以更好地保存国故。

由胡适等发起的“振兴国学”、“整理国故”运动也深深影响了图书馆界。杜定友、沈祖荣、李小缘、王重民等早期图书馆学家,接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自然热烈支持整理国故运动,他们带领许多图书馆大量购买当时一些重要的出版社如商务、中华、开明等影印或出版的大批古籍及新面世的甲骨文、简册、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珍贵文献作为图书馆珍贵馆藏,并对之进行科学系统的收藏和管理,既推动了图书馆管理思想的变革,更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传统通过图书馆而得以长久保存、源远流传。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新图书馆运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积极配合,共同促进了启迪民智、教育救国这一时代任务的顺利完成,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会呈文[A].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555.
- [2][12][13][14]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417,418,419-420,162-163.
- [3]凌美秀,曹春晖.中国图书馆两次新图书馆运动之比较[J].图书馆,2007(2):10-16.
- [4]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
- [5][6]范并思等.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90.
- [7]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之进行方针与计划[A].陶行知全集(第1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617.
- [8]李刚,倪波.陶行知与图书馆运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21-26.
- [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三)[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25.
- [10]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
- [11]中华教育促进社第二次社务报告[A].陶行知全集(第1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95.

作者简介:智晓静(1970-),女,厦门大学图书馆馆员,厦门大学中文系200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图书情报工作,中国现当代文论研究。